

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省际贸易的影响

○ 行伟波 李善同

导致中国省际贸易壁垒较高和国内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根据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各地区企业所有制结构以及地区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三类指标，本文分析了地方保护主义如何影响中国的省际贸易。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地方财政行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并没有显著影响省际贸易；在地方政府的各类变量中，地方税收中的国企比重能够较好的反映地方保护主义对省际贸易的负影响；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则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如果某地区国有企业份额越高，那么当地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封闭本地市场。

作者信息：

行伟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虽然经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全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是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经济仍具有很强的行政干预权力，因此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最大化、对本地企业的保护以及地方官员创造政绩的需要而设置地区壁垒的行为依然屡见不鲜。

一、引言

中国由于广泛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了地区间贸易壁垒，削弱了专业化生产所产生的比较优势，所以商品和要素难以根据回报最大化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虽然经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全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是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经济仍具有很强的行政干预权力，因此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最大化、对本地企业的保护以及地方官员创造政绩的需要而设置地区壁垒的行为依然屡见不鲜。在现实中，地方保护主义往往表现为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限制本地资源流入外地，以及设置各类隐性的贸易壁垒等。

由于难以对各类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进行直接的量化，所以本文构造几类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地方保护主义的变量，并检验其对中国省际贸易的影响。这些变量主要涉及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地区所有制结构和地区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三类。首先，出于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和承担支出责任的目的，地方政府会实行各种地方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尽完善使地方政府为了保护税基和增加本级财政收入，倾向于采取措施保护当地的税源。由此推断，相对于地方的经济活动总量，政府的财政收支比重越大，地方政府越是可能有激励通过分割市场来对本地税源进行支持与保护。其次，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仍然非常重要，因此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本地国有企业的利益。例如，地方政府从国有企业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企业，如安排亲戚、任免人事、广告赞

助等，并且国有成分较高的行业中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也较高。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目前仍然管理着地方国有企业，因此国有成分较高的地区其地方保护主义程度也可能较高。再次，就业是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地方政府承担着对本地居民就业的保护责任。对要素市场的保护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之一，具体的地方保护手段包括限制外来人员的就业、要求外来人员提供各种证明、支付额外的居住和教育费用等。地区间劳动力市场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会破坏地区间本应根据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也降低了各地区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而这种地区内生产的相对多样化可能会降低地区间的产品贸易。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部分表现为地区间存在工资差异，因此地区间工资差异也可能间接反映了各地区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政府的地方保护措施可能是目前中国地区间贸易壁垒主要的形式之一。本文把反映地方保护程度的指标具体分为三类：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比例、地区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地区间工资差异，然后在贸易模型中估计这三类变量作为一种贸易壁垒对中国省际贸易的影响。在国际贸易研究中，分析地区间贸易模式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引力方程。大量的分析表明，引力方程对于区域间贸易有着非常成功的解释力。引力方程的基本论点是：双边贸易流量与双边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与地理距离等各类贸易成本因素成反比。在引力方程中把许多影响双边贸易的因素控制之后，可以构造一个表示边界的虚拟变量以反映地区间行政边界等难以量化的因素，这就是地区间贸易的边界效应模型，边界变量的系数可以称为边界效应。

由于大多数类型的地方保护是以地区颁布的行政法规以及设置的地区壁垒等形式出现，因此各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程度往往难以直接量化。本文尝试在边界效应模型中加入间接反映地方保护主义的变量，并在控制了运输距离等贸易成本因素之后进行实证研究，分离出可能影响双边贸易的经济或政治变量。如果反映地方保护主义的变量确实对省际贸易产生了负的影响，那么说明地方保护主义确实降低省际贸易，其所代表的这类省际贸易壁垒就能部分解释省际贸易的边界效应。即如果在边界效应模型中加入地方贸易保护主义指标，那么其系数应该为负值，相应的边界效应也应该有所降低。本文主要分析 2004 年度的情况，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是当年各省间的贸易流数据、地区间的贸易距离数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数据、地方政府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以及各省中各类企业的产值、就业人数和工资数据。

三、地方保护的动机、能力及对省际贸易的影响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财政分权。在各类税收中，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税局征收，地方税由地税局征收并由地方财政自由支配。在确立了财权之后，更多的事权也进一步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尽力培育税源，扩大本级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某些财政支出安排来达到地方政府保护税源的目的。所以，地方政府不仅有动力扩大以地方税税源为主的地方财政收入（即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动机），

本文把反映地方保护程度的指标具体分为三类：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比例、地区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地区间工资差异，然后在贸易模型中估计这三类变量作为一种贸易壁垒对中国省际贸易的影响。

并且也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安排促进、保护和控制本地经济（即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能力）。本节在边界效应模型中加入贸易双方省份地方政府的各类财政收支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地方政府对地方保护的动机和能力两类，间接衡量了各地区的保护主义程度。

（一）地方财政收入：地方保护主义动机

根据来自各类文献的总结，本节把反映地方保护主义动机的财政收入指标分为三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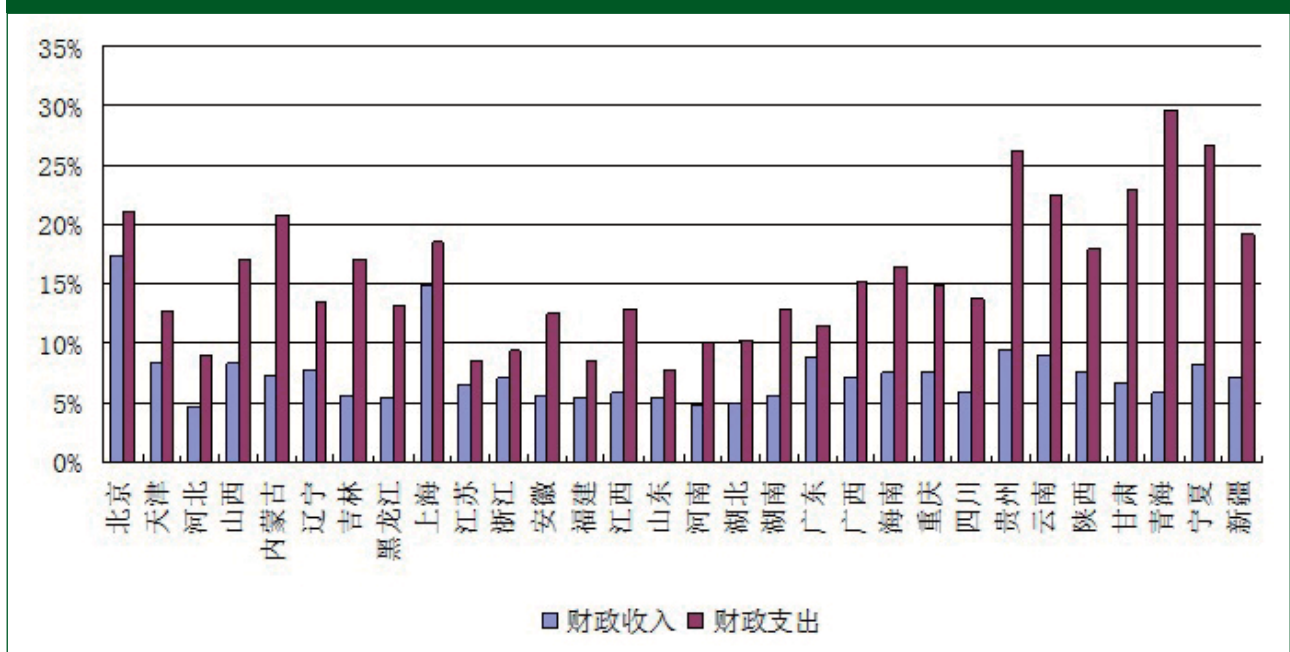
1. 地方宏观税负

地方宏观税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省各级地方政府控制本地资源的程度。图 1 列出了 2004 年各省地方财政收入占其 GDP 的比例。除北京和上海之外，大部分省份的宏观税负都在 5%-10% 之间，差距并不大。因此，可以预期各省地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考虑做出的地方保护其差距并不明显。把双边贸易地区的地区宏观税负相加作为宏观税负变量引入边界效应模型。此处的宏观税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值，这意味着贸易双方的宏观税负与省际贸易正相关。所以，或者各地区宏观税负变量不能较好反映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或者地方政府出于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考虑而设置的地方保护壁垒对省际贸易没有负面的影响。

地方政府不仅有动力扩大以地方税税源为主的地方财政收入（即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动机），并且也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安排促进、保护和控制本地经济（即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能力）。

或者各地区宏观税负变量不能较好反映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或者地方政府出于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考虑而设置的地方保护壁垒对省际贸易没有负面的影响。

图 1：各省地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分别占其 GDP 的比率（2004 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5》。

2. 地方税收份额

地方税收份额变量指地方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份额。由于共享税只有部分固定的比例属于地方政府，因此为了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必然会追求更多的地方税。在十几类地方税中，地方企业所得税

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本地税收的动机也不能较好的解释省际贸易壁垒。

各省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地国有企业的税收考虑而采取保护措施和设置贸易壁垒。

所以从地方保护主义的角度观察，并不能得出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程度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并对省际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的结论。

和营业税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出于保护税基的目的，地方政府完全有动力在本地区设置贸易壁垒以阻止外地商品的销售和维护本地企业。如果本地企业销售越多的产品和提供越多的服务，那么地方政府的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收入就越多，地方财政收入就越充足。所以，把来自于地方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作为地方税收份额变量，放入边界效应模型中进行回归。回归中地方税收份额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值，这意味着贸易双方的地方税负对省际贸易为正相关。这说明出于对本地税收考虑的地方保护主义并没有对省际贸易产生负的影响，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本地税收的动机也不能较好地解释省际贸易壁垒。

3. 地方税收的国企比重

国有企业营业税和国有企业所得税份额可以反映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程度。此比重越高，政府的保护动机越大，该地区的贸易壁垒就越严重。经过多年的国企改革，我国国有企业大多数属于资源类、制造业以及金融业，所缴纳的税种主要是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等。在计算地方税比重时，采用地方政府获得的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把贸易双边地区国有企业的营业税和地方企业所得税占总营业税和地方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作为地方税收的国企比重变量放入边界效应模型中进行回归。可以看到，地方税中的国企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预期的相同，即国企税收较重的地区其地方保护主义明显较大，省际贸易也相对较小。因此，各省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地国有企业的税收考虑而采取保护措施和设置贸易壁垒。

(二) 地方财政支出：地方保护主义能力

反映地方保护主义能力的地方财政支出指标也包括三类：

1. 地方财政独立程度

地方财政支出占该地区 GDP 的比率表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财政的独立程度，较高的比率意味着较高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白重恩等使用的地方保护变量就是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扣除科教文卫支出的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这个比率越大，地方政府越有激励出于财政支出的考虑来分割市场。但是回归模型显示地方政府财政的独立程度与省际贸易却是正相关的。所以从地方保护主义的角度观察，并不能得出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程度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并对省际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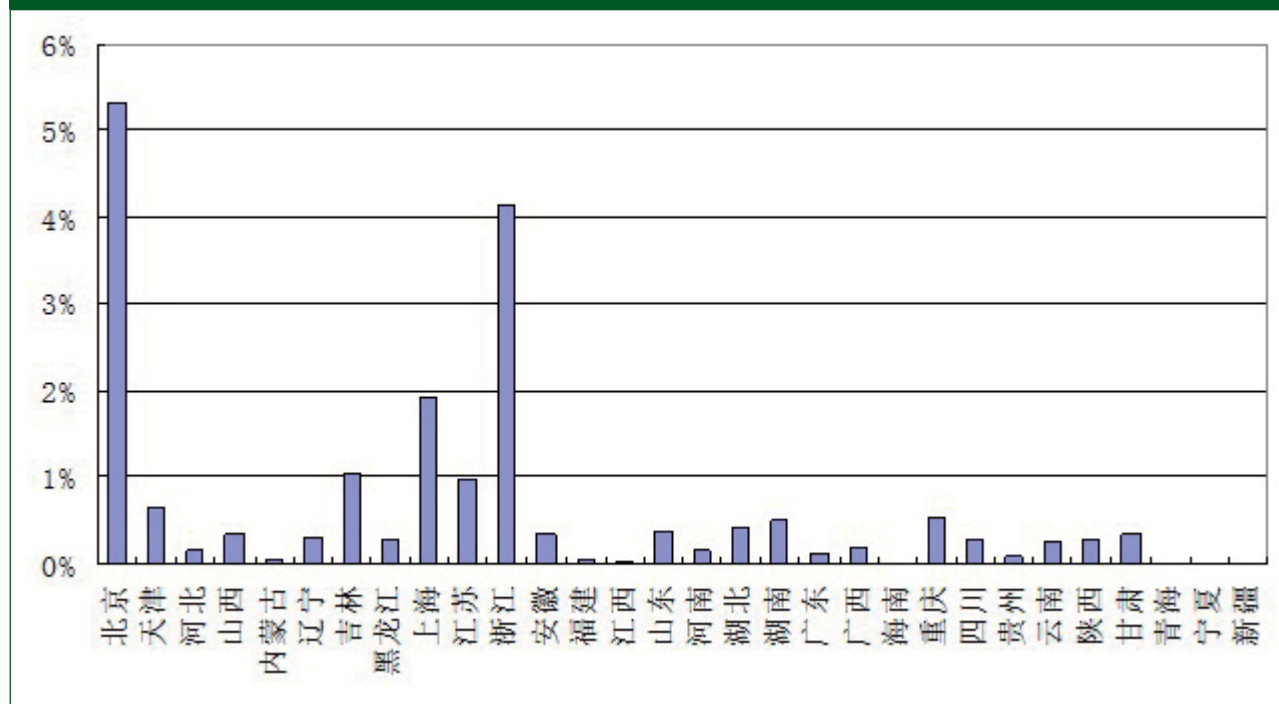
2. 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补贴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补贴项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的地方保护行为。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科目中，反映政府补贴的项目是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和各类政策性补贴两类。在中国的财政收支账目中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被视为负的收入，但实际上是一种财政支出。图 2 是 2004 年各省市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占地方财政支出的份额，表示了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扶持。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的地方政府的补贴反而越多。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补贴也是一种地方保护措施，扶持本地企业会扩大本地企业的生产，进而在本地生产更多的商品；另一方面，更多的补贴会

使得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也会促使本地企业将产品销往外省，进而增加了省际贸易。这两种力量可能使得地方政府补贴变量对省际贸易的影响难以预测。在边界效应模型中加入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补贴变量，可发现补贴变量对省际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值。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使得本地企业生产更多，因而省际贸易增多。

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使得本地企业生产更多，因而省际贸易增多。

图 2：各省市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占地方财政支出的份额（2004 年）



数据来源：国研网。

3. 地方政府直接投资

除地方政府设置的贸易壁垒外，政府的保护效应还包括直接对本地产业进行的投资扶持，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可以看作是对本地企业的更广义的“补贴”。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国企补贴、政府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三项。本文把这三项之和作为政府直接投资变量。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与省际贸易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个结果意味着，在此统计口径下的“政府直接投资”并不是阻碍区域间贸易的主要动因。从实证结果来看，这种正向关系可能存在三个原因：第一，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行为会在整体上促进地区间的分工，进而增加地区间贸易；第二，政府投资增加了基础设施，进而使贸易成本下降，区域间贸易流上升；第三，更多的补贴会使得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促使其扩展外地市场，进而增加了省际贸易。

“政府直接投资”并不是阻碍区域间贸易的主要动因。

四、企业所有制结构与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国有化程度

本节进一步分析地方对国企保护带来的区域贸易影响。如果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有企业的保护，那么地区经济的国有化程度能够显著影响地区间的贸易量。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相应的就业问题是决定本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和地方官员升迁的一个

重要因素。首先，由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普遍不强，因此在国有企业比重大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设置贸易壁垒，鼓励本地企业的销售。所以一个地区内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发展能够间接反映出该地区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程度。另外，地方政府有更多特殊的方法从国有企业获得利益，因此国有成分高的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也严重，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国有成分比例较高的行业。

其次，本地居民的就业水平也是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目标之一，而就业的水平直接与本地区经济的国有化程度有关。从地区内企业所有制结构来说，如果某地区的国有制企业份额越高，由于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当地的就业问题和财政收入问题等带来的政绩，所以更可能倾向于阻碍其他地区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和极力推荐居民消费本地产品，从而导致各地区间市场的分割。因此，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地区间贸易的因素之后，考虑了国有企业份额变量后会相对较小的地区间贸易流量和相对较大的地区内贸易流量。在国有企业份额大的省份之间，省际贸易的流量可能会相对较低。另外，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和港台投资企业不属于地方政府所有，并且这类企业更倾向于在全国发展，因此这两类企业份额较大的地区其省际贸易应该较大。

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国企份额系数都为负值，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产值、工资额分别占有企业类型的职工人数、产值、工资额的比重都与省际贸易成负相关。如果把两个地区的比重分别放入模型中，可以发现货物流入省的国企收入份额系数显著为负数，大于货物流出省国企收入份额的数值，这说明货物流入省份的地方保护对省际贸易的负影响更大。分别把外国投资企业和港台投资企业的三类比重放入边界模型进行回归。可以发现三类比重都与省际贸易成正相关，所有回归的两类企业份额系数都为正值。这说明外国投资企业和港台投资企业对省际贸易有促进作用。仅对制造业部门进行检验，则发现基本结论和所有行业中三类企业比重对省际贸易的影响相同。

五、地区间工资差异与地方保护主义：劳动力市场分割

本节进一步分析地方对本地居民保护带来的区域贸易影响。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程中，中国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仍然存在许多障碍，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处于分割的状态。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体现了地方保护，而地方保护影响了省际贸易，因此可以检验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省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出于政绩和本地社会稳定的考虑，地方政府有动力对本地居民的就业进行保护，因此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对本地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影响到居民的工资和就业，这是地区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由于劳动力不能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以及各种就业的制度性限制，所以地区间工资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根据企业所有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观测到的工资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边界效应模型中加入地区间不同类型企业雇员的工资差距变量作为衡量地区间劳动力障碍的因素，分析各省人均工资差异对省际贸易的影响。具体做法是计算贸易双方人均工资水平的差异后，然后放入边界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首先，考虑全部企业的工资水平对省际贸易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在全部行业还

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国企份额系数都为负值，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产值、工资额分别占有企业类型的职工人数、产值、工资额的比重都与省际贸易成负相关。如果把两个地区的比重分别放入模型中，可以发现货物流入省的国企收入份额系数显著为负数，大于货物流出省国企收入份额的数值，这说明货物流入省份的地方保护对省际贸易的负影响更大。

是在制造业中，贸易双边的人均工资都对省际贸易产生正的影响。其次，如果把贸易双边地区的人均工资之比作为工资差异变量，放入模型中则能够得到与基本模型相近的边界效应，并且地区间工资差异与省际贸易都呈正的相关关系。这说明，无论是全行业还是制造业，地区间分企业类型的工资差距越大，省际贸易越大。因此用工资差距反映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省际贸易流动并没有负的影响。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原因是：第一，遗漏了其他影响工资差异的变量，如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因为不同技术水平的雇员显然工资会有差异，也没有控制地区的产业结构，而不同产业中雇员的工资水平也有很大差异；第二，地区工资差异和省际贸易背后或许有共同的影响因素需要进一步分离。

六、结论

地方政府的各种地方保护政策不仅给经济带来低效率，而且阻碍了商品跨地区的流动。本文总结了各类文献中提出的三大类地方保护主义的动因来构造三类潜在的反映地方保护主义的指标：地方财政收支、地区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地区间劳动工资差异，然后在边界效应模型中分析这些变量对中国地区间贸易的效应。本文的分析仅基于 2004 年这一特定的年份，结果显示：（1）在构造的三类指标中，很多变量或者无法反映地方保护程度，或者这种地方保护因素并非是阻碍贸易的主要壁垒；（2）在考虑了几种可能的地方保护主义因素之后，省际边界对省际贸易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本地国有企业的目的阻碍地区间贸易。■

因此用工资差距反映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省际贸易流动并没有负的影响。

本文改编自北大 - 林肯中心工作论文，编号“W079- 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省际贸易的影响”，已正式发表于《南方经济》2012 年第 1 期。详情参看：<http://www.plc.pku.edu.cn/index.php?optionid=720>

■ 新书简介

绿色中国梦 ——评《中国环境政策与城市发展》

郑颖尔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生

近 30 年来的中国一直在高速经济和生产力主义的轨道上飙升，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皆有巨大影响。当人们发现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带来的是笼罩京城一月不散的毒气雾霾，是黄浦江上漂浮的腐臭死猪时，洁净的空气和山水已成奢侈品。我们不禁要问，这三十年来我们到底对环境做了什么，为环境做了什么？

由满燕云教授编辑，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出版的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URBAN DEVELOPMENT*（《中国环境政策与城市发展》2013 年）一书试图从城市环境政策与发展角度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该书较全面地记录与评述在经济急速发展、城市化快速进行的 30 年间，中国面对环境恶化所进行的各种实践。多位环境和经济专家从不同视角分析并反思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并总结了国际上的经验和教训，展望了未来中国发展的绿色道路的可能。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中国环境政策的现状入手，分析传统的以控制命令为主要手段的环境政策在中国产生的背景与发展脉络。同时对近年来中国政府借鉴国际的经验，尝试使用市场工具来控制 and 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政策作了梳理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环境政策效率低下很大程度是因为一直以来使用这种僵化的行政手段所造成。少量的市场手段的尝试，并没有对整体环境问题有多大贡献。

第二部分“城市发展与环境”主要从工业排放和生活排放两个方面阐述了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日益富裕、制造业全球化、城市化和气候变化作为当今推动中国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这种观点已被广泛地传播。但是究竟这些因素在环境变化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有多大的影响力？本章节学者们通过经济学的视角，用定量化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分析，得出在工业方面产业的集聚，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对

中国环境有正面的影响。而在生活方面，收入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生活中的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大幅增加。

第三部分“绿色城市规划”集中讨论中国城市在不同的城市形态，道路交通措施，生活方式下，导致不同的能源使用、污染排放的表现。学者们认为蔓延化的城市形态，低效的能源使用方式是造成中国城市高排放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能够通过一系列手段进行改善，例如促进城市形态紧凑化方面的战略，关于住宅建设和居住环境建设的创造性方法，交通改造的措施，特别是有效地限制或替代机动车使用的做法。这种改善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降低对能源的依赖，同时还能获得高品质的生活。

第四部分“环境税收、政策的影响”将视角聚焦在环境税这个 90 年代以来在国际上非常热门和有效率的环境政策新手段。环境税不仅具有保护环境的潜力，而且还有提高经济效率，减少经济扭曲的作用，因此在 OECD 成员国内被广泛使用。环境税中的碳税更是被认为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机制的重要环节。而中国从确立排污收费制度以来，历经多年改革，在税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税收具有环境税的职能。本章节立足中国实际，用国际的视角对中国环境相关税收的现状进行定量化的分析对比，从经济现状、国家能力、发展潜力等角度去思考中国与国际发达国家的差异，并给出一些可行的改革方案。在全球气候变化层面，学者用 CGE（一般均衡模型）评估了中国实施碳税会产生的环境和经济影响。得出碳税在短期可能对中国经济有较强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是有促进作用的。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URBAN DEVELOPMENT（《中国环境政策与城市发展》2013 年）一书从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和改革开始，勾勒出中国环境政策的整体框架，就城市化与环境、

绿色城市规划和环境税收政策这三个热门话题进行深入归纳，总结中国在实践中绿色发展道路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对未来发展做出了基于实证的研究建议。

中国环境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政策手段的单调、僵化导致的环保效率低下要负很大的责任。在政策实施层面，虽然政府多次强调要将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但是实际上目前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行政手段。十一五、十二五的减排目标都是用实行行政包干制度达成的，而更有经济效率、灵活性的环境税收到现在还迟迟得不到正名。同样，排污权交易也是仅在几个省市做了小规模试点。在政策研究层面，虽然已经对国际上有效的环境政策经验，特别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如环境税费、可转让排放许可

证、保证金退还制度等）做了丰富的介绍和调研。但是在与中国本土国情相结合方面，如何提出真正可实现的有效率的方案这方面，还缺乏有影响力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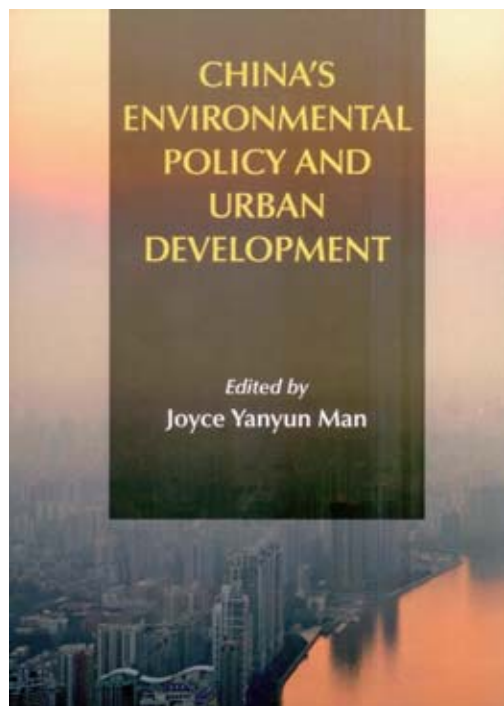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芸芸，既有经济学家，环境学家、还有城市规划专家等等。横侧兼顾，多管齐下，他们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尽管现在存在不足和缺陷，还是坚信过去的实践经验能给中国未来向可持续方向的转变带来希望，可以努力去争取最好、最合理的未来。纵观国内外中国环境政策的研究著作，无论是自上而下（环境法律和法规）的宏观研究，还是自下而上（环境事件）的分析，或许也已经司空见惯，但是由系统的政策梳理，详实的数据检验，用准确的信息对中国的环境问题进行解析，并提供独到见解的工作却不多见。而这部书却做到了这点。■

中国环境政策与城市发展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Urban Development

满燕云 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02



概要：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URBAN DEVELOPMENT（《中国环境政策与城市发展》2013年）一书从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和改革开始，勾勒出中国环境政策的整体框架。就城市化与环境、绿色城市规划和环境税收政策这三个热门话题进行深入，归纳和总结中国在实践中绿色发展道路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对未来发展做出了基于实证的研究建议。

作者简介：

满燕云，现任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及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及教学集中在公共经济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公共财政、住房经济学、土地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关键词：

环境政策 城市化 绿色城市规划 环境税

发展中国家大都市政府融资

Financing Metropolitan Governm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美】Roy W. Bahl 【德】Johannes F. Linn 【美】Deborah L. Wetzel 编著

陶然 等译

科学出版社 2013-05



关键词：

大都市 政府融资 贫民窟 城市化进程

概要：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最美好的希望，城市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些新兴的大都市该如何治理？更紧迫的是，如何为这些大都市进行有效的融资？

本书对发展中国家大都市治理与融资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关注发展中国家大都市治理与融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讨论具体实践时的情况，探索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差距，并最终给出一个可供参考的改革路径。其中，关于政府的支出结构和融资工具的再思考，必须放在一个大环境下进行，包括政府的组织结构、当地经济的特征、基础设施情况、贫民窟在城市中的集中程度以及外部的融资选择。此外，是否能为解决大都市融资问题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还将取决于领导人能否灵活放权。

译者简介：

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公共经济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林肯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专注于与中国正在进行中的经济转型相关的多个领域。主要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城市化、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发展，地方治理及公共财政等几个领域。近年来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 多篇，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融入未来——预测、情境、规划和个案

Engaging the future: Forecasts, Scenarios, Plans, and Projects

【美】 Lewis D. Hopkins, Marisa A. Zapata 编著
韩昊英 赖世刚 译
科学出版社 2013-05



关键词：

未来 预测 情境 规划 个案

概要：

规划师在面对未来“可知性”问题时应如何去做？现有的技术已经能够帮助其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本书对这些技术进行了详细回顾，并告诉读者它们如何能在从邻里到区域的多种尺度上被整合为制定及使用规划的连续过程。本书不仅是讲述“如何去做”的书，还是讲述“如何思考”的书。当读完本书后，你将会以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认识这些技术以及整个规划过程。

本书中各章的作者由不同行业的专家所组成，从技术思维的学者到实用主义的执业者，从人类学者到企业战略者。他们将多元化的视角、专家经验和哲学立场带给读者。

译者简介：

韩昊英，浙江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Journal of Urban Management* 国际期刊执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规划决策和城市增长管理。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Land Use Policy*、*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和 *Cities* 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以及《城市规划学刊》、《规划师》、《地理学报》和《中国土地科学》等国内知名学术期刊上。

赖世刚，浙江大学讲座教授，台北大学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系教授并兼任城市治理英语硕士学位学程主任，同时也是 *Journal of Urban Management* 国际期刊的创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复杂与规划理论。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Land Use Policy*、*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Omeg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和 *Decision Sciences* 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其他主要著作包括 *Urban Complexity and Planning: Theories and Computer Simulations* (Ashgate, 2013) 以及《复杂：城市规划的新观点》(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转型中的中国地方公共财政 China's Local Public Finance in Transition

满燕云 康宇雄 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11



关键词：

转型 中国地方公共财政 分税制
房产税 转移支付

概要：

本书译自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出版的 China's Local Public Finance in Transition。

30 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经济发展十分迅猛。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不过节奏依然较慢，公众关注度也不高。1994 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将财权集中到中央政府，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本书便讨论了这次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试图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本书讨论了三个政策选择，以应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第一是寻求新的财政收入来源，比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房产税。第二是改革并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这种方式有助于解决不同省份之间的收支差异。第三是重新讨论财政支出负担的分配，增加中央政府的支付比例，使地方财政收入总量与财政支出负担相匹配。

作者简介：

满燕云，现任北京大学 - 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及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及教学集中在公共经济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公共财政、住房经济学、土地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康宇雄，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城市发展博士学位和城市规划硕士学位。在林肯研究院主要从事财产权利和义务、土地管理工具、地方公共财政等领域的研究。曾任俄亥俄州亚克朗大学 (1999 - 2003)、香港科技大学 (1996 - 1998) 助理教授。



中国制造业区位：区域差异与产业差异
The Loc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贺灿飞 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10-11



精明增长政策评估
Smart Growth Policies: An Evaluation of Programs and Outcomes

格雷戈里·K·英格拉姆、阿曼多·卡布内尔、康宇雄、安东尼·福利特 著
贺灿飞 邹沛思 尹薇 译
科学出版社
2011-06



中国的住房改革及成效
China's Housing Reform and Outcomes

满燕云 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7



中国低收入住房：现状及政策设计
Low-income Housing in China: Current Issues and Policy Design

满燕云 隆国强 景娟 等编
商务印书馆
2011-12



经济转型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区位战略

贺灿飞 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12-05



可持续城市防灾减灾与城市规划：概念与国际经验

张洋 吕斌 张纯 等著
科学出版社
2012-06